

成都风物

第二輯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

第二辑

成 都 风 物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

一九八一年 成都

既爾且崇
實歸成都
辛酉夏鍾傳刻

成都风物

第
二
辑



深切的关怀

—沙汀同志谈《成都风物》（1）

蓉城史话

少城春秋 戴盛昌（7）

成都风云

“五四”运动在成都 陈竹影（16）

大川饭店打瘟神 丛云（23）

刘文辉通风报信 车耀先避险脱身
张蜀直（36）

锦里漫游

武侯祠后殿的铜鼓 汪潜（43）

成都的黄忠墓 郑光福 苟治平（47）

大圣慈寺话沧桑 王治平（50）

贵妃之墓何处寻 广复（57）

文苑轶事

女诗人薛涛 李思楨（58）

全国三长联 陈雁肇（67）

一代风流

绿叶丹心耀锦城

一记十二桥烈士许寿真 成世（71）

先知卓见耀诗篇 洪志存（79）

车耀先颂 张文澄（81）

1981.8

目录 1

古蜀钩沉

诸葛亮在成都的府第 陶元甘 (83)

藏经楼的秘密

一文殊院故事之一 李金彝 (87)

范涑为杨雄平反

一子云亭故事之一 余一成 (96)

工商坊肆

同仁堂老店新开 白 丁 (101)

饮食店的招牌艺术 东方木 (109)

川味名食

从《姑姑筵》到《哥哥传》陈伯为 (113)

“爱国馍” 市 仁 (120)

街巷闾里

成都街名琐记 陶亮生 (122)

民间故事

赵乙已吃赖汤圆 赤 叶 (134)

洗马池畔退敌兵 王 琦 (138)

水烟袋铺一乘烟观 范 航 (141)

启 事 编 者 (144)

扉页题词 魏传统

封面设计 谢梓雄

封面题字 余中英

装帧设计 晏 白

成都风物

《锦江演唱》增刊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

成都市华民印刷厂印刷

每册工本费0.39元

目录 2



深切的关怀

——沙汀同志谈《成都风物》

七月四日上午，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分会杨槐同志写信告诉我们，沙汀同志看了《成都风物》（第一辑），对这个集子很关心。于是，我们通过《四川文学》编辑部转告沙老，我们要去看望他，听听他对《成都风物》的意见。

下午三点，我们去到沙老的住所，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向她说明来意后，她悄声说：“（沙老）中午咳了好久，刚刚休息。”便把我们让到客厅内等待，接着给我们端上茶来。我们还没来得及喝茶，沙老已掀开门帘，从室内走出来。

“沙老，打扰您了！我们是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的……”我们站起来，向沙老说明了来意。沙老虽然身体欠佳，却还是那样热情、好客、健谈。还没有落座，便侃侃谈了起来。

“你们这个《成都风物》办得好，这种东西应当趁早搞，趁老一辈还在，把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出来。”他说：“五十年代，有个江绍源搞过，不过面比较窄。许地山还专门研究过辛亥革命后结婚仪式的服装的变化。李劫人对成都的风土人情很有研究，在他的《大波》中保留了不少。中国幅员广大，各地风俗不一样，青年人不懂，有些搞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李劫人的《大波》，对于风土人情方面也不

懂。所以希望你们抓紧时间，趁老一辈人还在，把它发掘整理出来。”

沙老又从杨槐同志发表在《成都风物》第一辑上的《不准演出的演出》文章谈起，他说：“影人剧团来成都，当时严啸虎不准演出，为了争取演出，我还找过王干青，希望他通过张表方（张澜）设法解决。熊子骏他们更劝说我到武汉找郭老。郭老当时在总政治部三厅里。成都的许多群众运动，还有些民间传说，都应该点点滴滴的搞出来。”

接着沙老例举了成都许多应该发掘整理的东西，他说：“象四川的币制变动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就应该写，解放前的安乐寺（解放后的红旗商场）、中山公园（现工人文化宫）就是货币投机市场，那里面有许多东西可写。抗战时期的奸商囤积居奇，那有好多东西可以写呀！四〇年我在重庆工作。到枣子岚垭去看从延安鲁艺讲学后到了重庆的茅盾。闲谈中，我告诉了他一个故事：有人买了两箱洋钉存起，不久洋钉价钱猛涨，他拿去抵押，从银行里贷了一大笔款，又把贷的款买成洋钉，就这样反复搞了几年，竟然成了巨富。茅公立即掏出本子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解放前货币贬值，票子不值钱了。人们拿它糊墙，把铜元截成两半边用，还把银元换成筹码，拿筹码当钱用，农村中用米当钱买油买盐。现在的年青人，只看到十年动乱，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也就不知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把这些写出来，通过新旧对比教育青年人。”

沙汀同志接下去又说：“要谈旧社会人民的穷困，真太多了！前两天我的小外孙为我摇扇，我告诉他，建国前一些穷小子，在茶坊酒肆‘卖风’的情形：拿把蒲扇，悄悄在阔

人背后摇将起来。有的人，临走时大发善心，给一点钱；不少人，你才扇了几下，他们就立刻回过头大声训斥：‘快滚！看把老子扇凉了！’，象这些现象都值得让青年人知道啊！”

沙老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川戏。他说：“川剧的传统和演员轶事，象康芷林、天籁，《戏剧与电影》登了一些，你们也可以搞。去年回四川，听了一两次‘围鼓’，见一个唱胡子生的唱《绛霄楼》：‘携玉手登高楼……’嗓音嘹亮，穿得整整齐齐，唱完以后他就走了，我赶紧向一位年老听众打听，他告诉我那唱胡子生的是个医生。我小时候住在小县城，逢到夏天，总有些人在城外田野间边走边唱，一般人取笑它叫‘骂田坎’！实际也是一种消遣。四川的‘围鼓’很象北京的‘票房’。川剧的不少名演员就是唱‘围鼓’的‘玩友’出身。贾培芝是个机匠，爱唱‘围鼓’，先被灯影班子看上了，以后川剧班子请他去唱，这才‘下海’成了职业演员。浣花仙也是‘玩友’出身。天籁原来是唱京戏的，对川剧的胡琴唱腔有显著创新。那样有名的演员，谁料到最后死在一家剧院的票房里！名噪一时的筱群芳的下场也很凄惨。只有解放后在重庆去世的周慕莲死得其时，重庆文艺界曾为他举办了相当隆重的葬事；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廖静秋有很多轶事，可写的东西不少。”

接着，沙老又把话题转到曲艺方面。他说：“和贾瞎子同时唱竹琴的还有个姓吴的，虽没有贾瞎子出名，却唱得很好。曾经有人为他的被埋没大鸣不平。大家只知道李德才的洋琴唱得好，还有个石老三也唱得好，他唱《楚道还姬》的胡子生，就连哼一声都很有味道，是个了不起的演员。有个姓王的数学教员，每天坐起私人包车跟着李德才、石老三

跑，听他们唱扬琴。书场应当存在。五十年代，我引一个外省同志到打金街的书场里听扬琴，听完一折后走出书场，他笑向我说，就象做了一场梦一样，很高兴。人们要受到教育，也要得到正当休息，经过休息，明天就可以精神百倍地去工作。总之，凡是健康的，使人得到有益的正常休息，增长见识的曲艺品种，每一种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应该加以记述、研究。。”

“吃的方面也有值得写的。”沙老又谈起了川味名食：

“象朵颐的脆皮鱼，三洞桥的红烧鲢鱼。二十年代开设在北新街的精记饭店，不卖炒菜，专卖蒸的、烧的、炖的、凉拌的，一进去就端上来吃，真是方便简单，不必老等下去浪费时间。东大街一带夜市，也很有些特色，不少卖吃的在阶沿边摆张长长的条桌，几张板凳，一般都夹大蒜蹄花，青笋烧鸡，也卖大曲，菜的分量都小。我在盐道街省师读书的时候，有时也喜欢去光顾一下。李劫人还开过馆子，叫‘小雅’，取‘雅俗共赏’之意。因为张澜受到坏人排挤，李劫人愤而辞去教职，不教书了，开馆子谋生。”

沙汀同志说：“在旧社会的知识阶层中，象李劫人这种人是很难得的，对于黑暗势力，以及依附军阀官僚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敢于讽刺揭发。他对杨森的宠儿黎纯一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黎纯一登广告为其男友寻求对象，他就用李顺义的假名登一广告，为其女友寻求对象。因为措词尖锐，结果报馆被查封，他本人也被拘留了一阵子。后来名教育家夏斧私（夏洵）有一首打油诗，其最后两句就指的这件事：‘报馆无端遭封禁，威占龙丸引兴长。’我这些介绍恐怕你们也未必全懂吧？但请原谅，我不多作解释了。”

在谈到成都的革命斗争史方面，沙老说：“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可写的题材，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纪念闻一多在昆明遇害的追悼大会，都有不少小故事、小插曲和群众的反映可写。特务的捣乱更加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打藩库’，杀赵尔丰，也可以搞一个专题。有的人不了解袍哥的发展史，辛亥革命要没有袍哥，就没有保路同志军，保路运动怎么能搞得那样轰轰烈烈？后来，地上豪绅钻进了袍哥，利用了袍哥。还有，就是袍哥本身。有些因为有了权力、地位，也变质了。”他还说：“刘师亮也可以写，他在商业场开了个小小的古董店，编写过多期《师亮随刊》。每年双十节，他都要在商业场大门口写副对联，象，‘当庆当庆当庆’这一联当时流传很广，因为他叫人想起旧社会端公、道士为死人的亡魂‘开路’做法事的敲打乐器的声响。刘湘死后，很多人送挽联，他也写了一副：‘有的人如丧考妣，叫我说不是东西。’那时候，军阀每年国庆的时候都要把他抓起来关几天。可他并不因此就不对黑暗嘲讽了。”

沙汀同志认为：“《成都风物》可以作为风俗志来搞。象周孝怀搞的“烟、厂、唱、场”，婚丧嫁娶的风俗等等都可以编写进来。”他说：“文史资料内容丰富，但它着眼在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叙述社会风貌的东西不多。在写作方法上，要用小故事、小插曲来写，写群众对大的政治事件各式各样的反映。一定要具有形象性，这样读起来才生动。”在编辑方法上，沙汀同志说：“要有一个通盘计划，有目的去搞。要分类选题，要去查报，可以查《新华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工商导报》，别的旧的报纸，也

可以从反面查出有用材料。要分类，每期要有一个重点，或是以时间来划分。”

谈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便起身告辞。但沙老的兴致未尽，送我们到门口时，又叮嘱我们：

“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专家，你们要走出去向他们请教，象街道居民中的老住户，他们就知道很多东西。比如解放前成都人做饭前为什么要刮锅底？‘把把柴’是如何烧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茶馆？他们会告诉你很多东西。”他还说：

“二十年代，我在成都读书的时候，连吃水也不象现在这样方便啊！我有篇小说叫《恐怖》，为了渲染气氛，曾经写到城外百花潭一带的特大水车在夜深人静时的声响，现在恐怕连三十岁左右的人都无法理解，更无法体会了！那些大水车可就是当年的‘自来水厂’安置的，利用它们为居民提供饮料！”

我们被沙汀同志的殷切关怀深深地感动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

《成都风物》记者



·蓉城史话·

少城春秋



戴 盛 昌

外地人游成都，至东城根街，常奇怪地问：“据说皇城是旧成都府的中心，为什么它西边的街道却叫东城根街？”

“老成都”向他解释：“东城根一带是旧成都府少城的东垣，东城之根嘛！”提问者更加不解。“啥叫少城？”对这个问题，尽管是“老成都”，也难用三言两语讲清楚。那就让我们一起，到古蜀典籍，历代方志，骚客诗篇、墨士文稿中，涉猎一次少城的沧海桑田吧！

早在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时，成都便有太城（亦称大城）和少城（亦称小城）了。《辞源·太城》条说：“太城，

城名，即今四川成都市旧府城之南城。相传为秦张仪、司马错所筑，一名龟城。其西城称少城，又曰小城。”

相传秦并巴、蜀后的第六年，即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丞相张仪，蜀守张若在建成都城时，遵照秦制，依样咸阳，于太城的西边，建造了少城。并在少城中“修建闾闾，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见《华阳国志·蜀志》）使少城比大城更为壮观。这就是成都少城史的开篇。

由于成都地近西南边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很重要的位置。从秦、汉、蜀汉以至后来的晋王朝，对成都的建设都十分重视，对少城的装点更倍加关切。他们为少城开设九门，城中“广填华屋，置楼、观、榭、圃，并饰以金碧珠翠（见《酉阳杂俎》），使整个少城好似天宫神宇一般。故前人有诗赞少城说：“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廉总不如”。扬州是我国江南名城，它以豪华秀丽而见于史上，说扬州不如成都，虽然夸张过头，但少城的壮美也可想而知。

我国古代，城墙是作为防御体系而兴建的。在城上建屋宇，造楼阁，除供守城将士居住外，还为了显示城廓的雄伟和壮观。少城也不例外。少城上的楼阁也是从张仪开始建造的。它的建造，还为了标示城市的方位。《成都古今集记》说：“初，张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以城势稍偏，故作城楼以定南北。”张仪筑的少城，有门就有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仪楼。《益州记》说：“少城有九门，南面三门。最东曰宣阳门，次西曰宣明门，张仪楼即宣明门楼也。”

张仪楼相传是张仪建成都城的遗迹。根据史书记载，我

们可以推知，宣明门和张仪楼的遗址，当在今天的柿子巷内。它的正南面的金河一段，就是昔日郫江故道。这座历史名楼临街瞰江，高跨城门，高轩朱扉，重阁复道，是自秦至唐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中，闻名蜀中的重要古建筑。因为它高百尺有余，汉代称它百尺楼，晋代叫它白菟楼。晋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重楼结曲阿，飞宇起层楼，累栋出云表，绕榭临大虚。高轩启朱扉，回望畅八隅，……西瞻峨眉岭，嵯峨似荆巫，……”对张仪楼的外观和气势，作了形象的描绘。

不知是战乱焚毁，还是楼占朽败，张仪楼在唐代中后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座古楼台——筹边楼。

筹边楼是少城的又一座颇有名望的古楼台，由李德裕主持兴建。李德裕又叫李文饶，他是唐代中后期的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丞相。唐文宗（李昂）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入川帅蜀，负责处理西南边防要务，筹边楼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建成的。《旧唐书·李德裕传》说：“李德裕建筹边楼于成都府治之西，四壁置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画其上。”可见李德裕建筹边楼的目的主要的不是为了登高远望，而是为了筹划边防事务。著名女诗人薛涛在赠李德裕的《上筹边楼》诗中写道：“平林云鸟入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上见边头。”

筹边楼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直到宋孝宗（赵春）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四川制置使范成大还慕其名，重建筹边楼于“子城西南隅”（见《蜀中名胜记·成都府》）楼成后，范成大作《水调歌头》颂其事，有“万里筹边处，形胜压

坤谁”之句。筹边楼在少城屹立了八百多年，直到明代，还保存着。

成都少城，有许多历史名人在其中居住过，如汉代的杨雄和严遵。杨雄，字子云，是汉代著名文学家，移居长安之前，居住在少城内。《寰宇记》说：“子云宅在少城西南，一名草玄堂。”也就是与“南阳诸葛庐”齐名的“西蜀子云亭”。现在的成都市第十三中学校就是当年草玄堂的故地。严遵，字君平，是汉代著名的学者和星象家，成都人一提到他就会联想到支矶石的故事。现在的君平街，是他当年住家之处，支矶石街曾是他卖卜的地方。又如三国时代的诸葛丞相府就在少城内。诸葛亮还曾在少城筑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见《太平寰宇记》）。武侯去世后，他的相府一直保存着。过了一百三十年，即东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李雄在成都建立成国后，在其宅基上建立了成都的第一座武侯祠。此外，汉代的大教育家、蜀郡太守文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等名人，也在少城居住过。

少城和成都大城一样，也是屡经战乱，屡遭毁败。第一次大毁败是在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大司马桓温入蜀，征成国灭李氏政权时。这次破坏十分严重，据《方輿胜览》记载：“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桓温为什么要这样下狠心呢？《酉阳杂俎》说他是“怒其太侈，焚之。”此次破坏，影响久远，直到二百三十多年后的隋朝初年，隋文帝杨坚封其子杨秀为蜀王，才把少城重建起来。

杨秀重建的少城，经以后各代的建设装点，又繁盛起来。唐代就有“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的比喻。到了五代，前蜀国和后蜀国的宫殿都在少城之中，他们对少

城的装饰更加不遗余力。再经两宋时期的建设，少城就更繁华了。“……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晚登子城》）从陆游的诗句中，对少城的繁华景象，可以领略个大概。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成都又一次遭受最严重的破坏，地面建筑，几乎荡然无存，连城郭都被摧毁，少城当然也不例外。清王朝统一全国时的成都，完全是一片破败景象。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巡抚司道田保宁率兵入成都时，接管的是一个满城颓垣断壁的烂摊子，他只好“草建城楼以居”（见《成都县志》）。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开始动工重建成都大城。过了四年，即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又附大城西南另建小城，作为“八旗”营地，专供满州和蒙古人居住，这就是后来的“满城”，也就是少城。《成都县志》说：成都“有少城大城，少城一名子城，今满城也。”

但是，满城的建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酝酿到建成，前后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清王朝建立初期，实行民族统治政策，再加上在服装和削发等方面推行强制措施，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因此，清军一入城，就把官吏、军队及其家属集中在少城遗址一带居住，这就是满营。最初，进驻成都的满蒙“八旗”军队，是从荆州抽调来的，所以称为“荆州营”。当时没准备久住。三年后，清廷从赴调的三千名兵丁内，留一千六百名永驻成都，其余归回荆州。康熙末年到雍正期间，成都旗军仅由副都统统率。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阿桂镇压了大、小金川少数民族起义后，奏请清廷，在成都特设将军一员，统率旗军，“控驭”西陲。旗军人数，自乾隆之后陆续增添，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

达二千六百七十三名。

驻防少城的“八旗”，无论是官是兵，俱可携带家属。为了减少满、汉的接触，避免民族冲突的发生，清政府又从外省调入部队，驻在满营周围。从福建调来的部队，设大、小福建营（在今西玉龙街）；由宁夏调来的骑兵，设宁夏营（即今天的宁夏街）。还从西北移来大批回民，迁入满营西侧居住。这样，就在满城西侧，设置了一道“防御”或缓冲地带。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由年羹尧主持建筑的满城，周长四里五分，高一丈三尺八寸。城门五：大东门、小东门、北门、南门、大城西门。城楼四，共十二间（见《成都县志》）。今天的东城根街，就是当时满城的东垣，也就是大城的“西墉”。满城的大东门，称受福门，在祠堂街口；小东门称迎祥门，在东门街口；北门称延康门，在东顺街口；南门称安阜门，在西较场中。西门也是大城的西门，称清源门，在西大街口。

同历代的少城比较，满城的建制有许多不同。整个少城共建大街八条，沿大街又建三十二条胡同。大街称“官街”，小巷叫“兵丁胡同”。胡同沿官街排列，就好象是条条蜈蚣，街是身躯，胡同是脚脚。

由于满城是专供旗人居住的，“八旗”的许多重要官署，都设在里面。这些官署中有：将军衙门（今红光西路268号院内）、左司（在东胜街）、右司、恩赏库（均在西胜街）、都统衙门（东长发街）、以及火药局、永济仓等等。今天的多子巷，原称刀子巷，是八旗的刀剑铸造地。满城中还设有官学一所，由“八旗”官办，选“八旗”优秀子弟入